

编者按:回眸2009年岁末在台湾举办的“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非遗”传承人一方面让台湾同胞感受到了中华“非遗”的魅力,另一方面也被台湾同胞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一片深情所感动。本报在此特选登两位随展人员的文章,从中可以品味这次大展的更多滋味。



台湾观众在“非遗”大展布老虎展区流连忘返。本报记者张小兰摄

2009年岁末隆冬,一股南下的“春风”,刮进了台湾同胞的心怀——这就是由大陆中华文化联谊会主办的第一届“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这可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举。兴致勃勃的同胞们扶老携幼争相观看,一拨拨青壮年看了又来……故国文化的根,牵动了万千同胞的故土情结。自2009年11月7日至12月20日,台北、台中的展场内外,上演了太多的动人故事。

见到“老虎”想起娘

赴台大展的头一站是台北“国父纪念馆”,迁台老人时常在这里聚会。消息传出,年届八九岁的离乡游子们纷纷前来参观,他们有的步履蹒跚,拄着拐杖,还有的坐着轮椅。

第二展场入口,是山西布老虎展区。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上百只布老虎吸引了众人观赏合影。许多老人在这里久久驻足,已经发颤的老手伸出指着,已经昏

一声俺娘泪潸然

——随“非遗”大展赴宝岛二三事

张建旺

春华秋实会有时

“根与魂”在台中展出10天,牵动了万千少年的心。幼儿园阿姨拉来一群群“小毛头”,正在读书的青少年学子排队涌入场。每一双年幼的、年少的眼睛,都闪动着万千的不解和惊奇。面对数十项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项目,这些在宝岛出生成长、与祖国隔绝的第三、第四代,心里充满太多的疑问和渴望。泰山皮影传承老人“一人一台戏,浑身十不闲”的精彩表演,令青少年们发出爽朗的大笑;目睹内蒙古剪纸大娘那一剪剪出的飞禽走兽,他们惊叫阵阵;看到古法造纸传承人双手从水池里托起张张毛边老纸,学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在这里,年青一代看到了他们平生还不曾见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见证了祖国先民的勤劳智慧,也令他们渴望“跟爸爸妈妈到大陆去看看”。

明台高中,是一所建校百年、

誉满台湾的私立中学。校董林芳英女士、校长林垂义先生得知“根与魂”大展到台中,当即决定停课半日,率领百名师生,分乘两辆大轿车,浩浩荡荡前来参观。同学们讲时鸦雀无声,会心时鼓掌大笑。为表达对“非遗”艺人的敬重,参观第二天,林校长专程给大陆“非遗”传承人送上了台湾名点“太阳饼”。

展厅里,台湾青少年散发出的逼人英气,令人怦然心动。承载着文化交流重任的这次“非遗”大展,最成功之处,莫过于把祖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了海峡两岸千千万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春华秋实,必定会有沉甸甸的收获!

依依惜别的深情

20天的展出,台湾同胞对祖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一往情深,令我们有些始料不及,许多观众连续数天前来参观。

前些年活跃在台湾政坛上的陈履安先生,70多年前出生在四

川,如今依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他三次参观大展,第一趟携夫人前来,兴致勃勃,赞不绝口;第二趟带来成箱甜点,慰问每位展出项目的传承人;第三趟再访,为的是再听一曲古琴,看一场南京云锦织造。祖国情怀尽在这位炎黄子孙满脸笑盈之中。

台北某建筑公司的普通工人张先生,是一位祖籍湖北的第二代台胞,对祖国传统文化颇有一股执著的热情。因为得知展览消息较晚,当他匆匆赶到展场时,已是台北展出的最后半天,结果观兴未尽,惆怅而去。谁能想到,就在“根与魂”转展台中的第二天上午,张先生竟从台北新店市倒了三次车,辗转百多公里,特地赶到台中展场。一看就是大半天,他傍晚搭乘高铁赶回台北,次日还要上班。张先生第三次光临展览,是专门请了年假前来。展出最后一天的中午,他第四次出现在展场,还带了一小包自制手工艺品——草编虫艺给“非遗”艺人们品鉴。那质朴的表情、亲切的话语,活脱脱一个“自家人”。

台中东海大学教职工杨永智,头一天身来到展场,连连叹息,后悔没带女儿来。星期六,父女俩手拉手出现在展场上。十几岁的少女,走到每位传承人面前,都亲切地喊上一声“爷爷”“叔叔”“阿姨”……展览最后一天下午撤展时,杨永智作为最后一名观众,恋恋不舍地离开展场。那频频回眸的情愫里,溢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限深情。

(本文作者为山西长治市锦绣坊厂长)

我在台湾交流蓝印花布技艺

吴元新

回首2009年,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在弘扬传统和对外交流宣传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海内外的展览、论坛、教育和传承活动多达20次,年末更赴台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为2009年的宣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要在大陆千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被选拔去参加“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实属不易。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因在收藏、研究、传承保护方面做出的特殊成绩,很荣幸得到台湾同胞:大陆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传承。大陆已有1000多个“非遗”项目、1488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得到保护,这次赴台交流就是一次大陆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两岸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交流活动。两岸蓝印花布的交流使得台湾蓝染技艺进一步了解了大陆蓝染技艺的历史和未来,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台湾地区蓝染技艺恢复和保护的现状。

在一个月的展览交流和考察活动中,我看到在台湾工艺研究所的扶持下,台湾地区已成立了台湾蓝染艺术家协会、台湾四季蓝染研究会、台湾三峡蓝染艺术协会等集体和民间相结合的传承团队;我看到了蓝染植物手工染坊遍布于各乡镇,形成了蓝染艺术的生活化;我还看到了台湾很多普通家庭在节假日带着子女去附近手工染坊学习蓝染技艺……在台北的展览中,我还听到台湾民众说“我们也有蓝染”“我们全家都做过”,这与10多年前台湾根本看不到蓝染技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非遗”展示月期间,我赴台湾大学举行了《艺染蓝花》中国蓝印花布历史与现状的演讲,讲授蓝印花布的历史渊源和图案艺术、演示蓝印花布工艺流程,受到了台湾大学师生的一致好评。此外,我还应邀到台湾母亲艺术基金会同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相关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这对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及加深两岸之间的了解与感情都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作为南通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蓝印花布艺术长期活跃在海内外舞台上,在传统工艺的学术交流、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蓝印花布的抢救和保护上都走在了国内前列。2010年,我们计划把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申报的过程也是一个宣传的过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代表性传承人,我在新的一年许下心愿:一定要努力做好蓝印花布的抢救保护工作,让南通蓝印花布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本文作者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江苏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



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右二)与台湾“文建会”副主委张誉腾(右三)等在台湾参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南通蓝印花布展位。本报记者张小兰摄

柏林电影节中国味何来

本报记者 宋佳烜

首映后的评价却是:作为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这部电影太平淡了。德国媒体认为,影片中“买菜”“做菜”“吃饭”这几个反复交替的场景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对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欧美人来说,不容易找到共鸣。还有一些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片中展现的老上海风情太刻意,不符合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

说罢导演说演员。继巩俐之后,余男成为第二个担任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的中国女演员,这对于国内电影界可说是又一次突破。国内媒体对余男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一片赞赏:国际化的打扮、流利的英文、大方的表现。然而,在德国媒体上——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媒体,却鲜少有对这位东方佳丽的报道。倒是《明星》网站上一个品评柏林电影节上明星装扮的栏目中,余男拔得头筹——颁奖礼上的余男,“苍白的妆容和紧紧梳到脑后的发型,使得她看起来像个妖怪”。更有网调显示,60%的德国网友认为余男的这一装扮奇怪雷人。

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繁荣,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影人和电影作品,越来越多的优秀电影、导演和演员开始走出国门,在国际影坛上一展风采。然而,面对这样的良好势头,我们更应该冷静地看待中国影视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过度渲染和勉强拼凑的正面报道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电影不一定有好处。不可否认历史文化是一个丰富的素材仓库;执著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希望其为国际社会接受和赞赏也是人之常情;纵观《红高粱》、《活着》、《喜宴》、《图雅的婚事》,貌似也都是因其特有的中国文化色彩才得以在国际影坛受到追捧。然而,正如《团圆》在柏林遭遇的理解危机一样,我们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过度依赖也令中国电影缺乏一种可以跨文化传播的能力。《阿凡达》与《孔子》的正面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面对品位日益提高、对电影也越来越挑剔的观众,只有那些有文化特色而无文化障碍的作品才能得到最多关注,才能让中国味香飘四海。

相比同样捧得银熊的波兰斯基,对于令中国电影界欣喜万分的王全安擒获银熊的消息,德国媒体也是反应平平。中国媒体眼中,王全安是又一位在柏林电影节两次获奖的中国导演,但德国最大的时事文化生活杂志《明星》的网站在影片

春节过去了,但是“春节”一词的英文译名引起的争议还在持续。这一争议源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虎年新春贺词。在这份贺词中,他一改往届总统使用 Chinese New Year 的习惯,而改用了 Asian Lunar New Year。这一改,“中国年”变成了“亚裔农历新年”,向中国人拜年也变成了向亚裔人群拜年。

据悉,奥巴马之所以在虎年拜年时改口,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因为 Chinese New Year 的名称引发了一些韩裔、越南裔移民的不满。

数种英文名从来不曾统一

说起春节的英文译名,西方社会通用的至少有3个:除了上文所提及的 Chinese New Year 和 Lunar New Year,还有 Spring Festival。通过网络搜索上述3个词汇,记者发现三者的使用频率以明显的落差依次递减。在维基百科上,三者则被统一在“Chinese New Year”的词条下进行解释。

观众多国政要的虎年新春贺词,可发现3个译名均被使用过。比如,英国首相布朗的虎年春节贺词用的是 Chinese New Year,美国驻华大使用的是 Spring Festival,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专门写给中国人的春节贺词中使用的是 Lunar New Year。

有趣的是,春节前位于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幕上展示了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寄语,很技巧地写成了 Year of the Tiger(虎年),

根本没有用到3个常用的词汇。

Lunar New Year 值得推广

对于奥巴马弃用 Chinese New Year,改用 Asian Lunar New Year 的这一举动,相当一部分中国网民表示“很生气”。网友“驴拉磨”说:“中国人的春节都过了几千年了,这样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过年的,奥巴马也要来挑战中国人的神经?”不过,也有网友比较冷静:“别国政要拜年也好,祝贺也罢,诚心与否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国人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推进中华文明。”

定居英国的 Affen 说,大概五六年前在英国上语言班时,他所写的 Chinese New Year 被老师纠正。这位老师的意見是,如果 Chinese New Year 成立,那么 British X'mas (英国圣诞节)、German New Year (德国元旦)之类的也应该成立。因为欧洲各国过圣诞节的习俗都有不同,新年过法也不完全一样。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硕士张野告诉记者,“春节”译成 Chinese New Year,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确是“敏感词”,因为东南亚一带也过

外国政要虎年贺词有“蹊跷”

本报记者 叶飞

这个节日。虽然其传统源自中国,但考虑到他们的感受,用 Lunar New Year 更加合适。

学者翟华认为,要短词的词汇如数字般精准是不可能的,“一物多名”是语言的常态。尽管 Chinese New Year 目前在使用英语的人中还是最常见的说法,然而在韩国人、越南人的眼里,这挥之不去的中国文化“阴影”让他们感觉有些抬不起头。在历史上,Chinese New Year 流行于美国,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当时,数以十万计的筑路华工将中国的春节习俗带到了美国。后来,在美的韩裔、越南裔对 Chinese New Year 的名称逐渐表达不满。20 年前曾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的美国学校里,一度出现过“华韩春节”这样的说法。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中性的 Lunar New Year 值得推广。不过,奥巴马在该词前面加了个 Asian,就有点儿冗长刻意了。

政治解读有无必要

综观目前针对此事的媒体报道和分析文章,大多讲奥巴马新年贺词顾此失彼——这种文化上的调侃和照顾了亚裔的面子,却忽略了中

国人的感受;有人认为这是奥巴马在会见达赖前玩的一个挑衅的“小把戏”;还有文章将矛头对准了韩国人,认为他们是促使奥巴马改口的始作俑者,认为春节的“中华属性”在被刻意淡化,成为美国裁判和调和族裔冲突的牺牲品。

有学者表示,对各国政要选择的春节英译没有必要进行过度阐释。实际上,各国政要在春节来临之际纷纷发表新年贺词,或向本国华侨致以问候,或向中国表

达问候,或对华关系表达愿景,一方面是问候和礼节,一方面也都包含了现实的考虑。此外,奥巴马此次视频贺词与过往总统只用白纸黑字发表贺词的方式大为不同;英国首相布朗、加拿大总理哈珀分别用汉语、广州话说出“恭喜发财”;潘基文用汉字写下“虎年大吉”……这些高调的行为都说明,中国春节的国际影响力正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而更加引人注目。

